

董晓芳, 李灿松, 刘晓凤, 饶允昌. 2024. 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时空过程与运作机制. 热带地理, 44 (7): 1184-1195.

Dong Xiaofang, Li Cansong, Liu Xiaofeng, and Rao Yunchang. 2024. Spatiotemporal Proces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Illegal Cross-Border Cattl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Myanmar. *Tropical Geography*, 44 (7): 1184-1195.

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时空过程与运作机制

董晓芳¹, 李灿松^{1,2}, 刘晓凤³, 饶允昌¹

(1. 云南师范大学 地理学部, 昆明 650500; 2. 云南省西南联合研究生院, 昆明 650092; 3. 新加坡国立大学 地理系, 新加坡 119077)

摘 要: 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是影响边境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开展其研究对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和双边贸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实地调研, 并结合历史文献档案和统计数据资料等, 深度剖析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时空过程, 并探讨了以“裙带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网络在此过程的运行机制。主要结论为: 1) 时间上, 非法跨境贸易大致经历缓慢增长萌芽期、猖獗发展期和明显下降消退期3个阶段; 2) 空间上, 以北线、中线和南线3条路线为主, 贯穿印度北部、缅甸北部, 最后进入中国云南; 3) 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依赖于自然地理环境和跨境“裙带关系”提供的信任、规范和执行机制, 从而形成完整的社会网络贸易链。最后, 建议通过简化正规贸易和加强智慧边境建设等方式来治理非法跨境贸易。

关键词: 非法跨境活牛贸易; 跨境贸易; 社会网络贸易链; 中缅边境; “裙带关系”

中图分类号: F75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5221(2024)07-1184-12

DOI: 10.13284/j.cnki.rddl.2023077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随着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复兴 (Gregory et al., 2011), 关键区域、敏感区域和问题区域日渐成为政府机构和学界关注的焦点, 边境地区也逐渐成为其重点关注的对象 (Ackleson, 2005; Ian and Li, 2017; Su and Li, 2021; Li and Su, 2022)。边境地区指边界两侧的社会、经济和地理空间, 由跨境互动所创造的机会和限制所界定 (Chan and Womack, 2016)。跨境互动往往会产生诸多边境问题 (Minghi, 1963)。冷战结束后, 关于边境和边境安全的研究迅速发展, 其也是政治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Newman and Paasi, 1998; Dean, 2005; Flint and Taylor, 2018)。尽管在公众认知中边界是静态且固定的, 但政治地理学者认为边界具有高度流动性和可渗透性, 在某种程度上是推动两侧相互联系与影响的综合实体 (Gereffi et al., 2005; Gellner, 2014)。边境是通过边界两侧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行动及

相互关系所建构的 (Newman, 2006), 对跨境贸易而言, 边境被赋予过滤商品和人员流动的功能, 从而成为一个“渗透、过渡”的空间 (Anderson and O'dowd, 1999)。此外, 边境地区也是一个妥协的空间, 对非法跨境贸易者而言, 边境既是生计和安全的资源, 同时也是对他们流动的一种限制 (Zhou et al., 2022)。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纵深发展, 边界经济渗透性日益增强, 生产国际化、金融流动性、贸易自由化以及运输和通信技术进步等, 不断促进和鼓励社会行动者之间日益增长的跨境联系 (Andreas, 2003)。但非法跨境贸易在将一系列的国家、区域和全球行动者联系起来的同时, 通过质疑国家控制其领土的能力来质疑“国家本身的合法性”, 对边境地区的国家主权构成挑战 (Little et al., 2015), 促使边境“庇护功能” (Andreas and Friman, 1999) 不断减弱。作为当前地缘政治学

收稿日期: 2023-10-08; **修回日期:** 2024-04-18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 (2023CX02); 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项目 (202105AC16005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9XGJ024)

作者简介: 董晓芳 (1997—), 女, 白族, 云南鹤庆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管理与开发, (E-mail) 1789101453@qq.com;

通信作者: 李灿松 (1980—), 男, 白族, 云南鹤庆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地理、南亚东南亚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研究, (E-mail) cansongli@126.com。

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非法跨境贸易使边境成为国家行使主权的关键场所，对边境及国家安全意义重大。

在“一带一路”倡议继续深入推进的过程中，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更加紧密，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也更加复杂多变（李灿松等，2014）。边境作为连接与周边国家的重要通道，安全问题影响并非局限于当地，而呈现“内传与外溢”的发展态势（吴泓，2017）。近年来，中国牛肉需求量猛增，国内牛肉产量和合法进口总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衍生非法牛肉流入，尤其在中缅边境区域，印度和缅甸大量活牛非法转运至中国。非法跨境贸易依赖于公共基础设施的供应，在逃避国家对跨境贸易的监管的同时对其构成挑战（Karras, 2009; Feldman, 2019; Aucoin, 2020）。其中，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指贸易商在缅甸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活牛，然后秘密运输到中国，而无需通关或缴纳所得税，双方贸易通过利用领土和行政漏洞，以逃避国家法规和商业限制获取利益。据实地调研，高峰时期每年经此跨境流入中国的牛约160万~200万头。缅甸是中国认定的疫区，口蹄疫、猪瘟等传染病横行，与一般商品不同，没有经过任何检验检疫的活牛非法入境后会给中国境内的牲畜和人民均带来潜在威胁，且会对边境两侧的经济、社会秩序造成巨大影响。但是，非法跨境活牛贸易是中国市场监管的盲区，学者很少关注这种贸易形式。因而迫切需要分析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这对研究国家权力在国家领土边缘的行使具有借鉴作用，对于保障食品安全、维护边境安全及经贸秩序等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中缅边境地区跨境民族交流互动中非法跨境活牛贸易为典型案例，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缅甸活牛如何非法跨境流入中国？2）这种流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哪些特点？3）这种非法跨境贸易具有怎样的运作机制？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本文试图绘制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过程，分析所涉主体及非法跨境贸易内在的驱动机制等，以期对加强边境社会秩序建设和维护边境安全提供重要现实参考。

1 相关研究进展

1.1 非法跨境贸易对边境的影响

非法跨境贸易会对边境地区经济、环境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产生一定程度的威胁。一些学者指出野生动物非法跨境贸易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威

胁，也是造成农业、牲畜和公共卫生的传染病和入侵物种的常见媒介（Smith et al., 2009; Phelps et al., 2010; Nijman, 2010）。也有学者讨论了非法跨境贸易对边境群体和国家经济的影响的差异，如非法跨境贸易虽然可为贫困家庭提供短期解决方案，但从长期看，会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挑战（Lesser and Moisé-Leeman, 2009）。从缅甸克钦大规模非法跨境流入中国的木材在将克钦当地的自然资源重新塑造为跨国资源的同时，也导致克钦当地商人的边缘化（Woods, 2011）。但非法跨境贸易并非“一无是处”，关于非法跨境贸易的另一种看法强调其对社会边缘阶层的作用、人口中丧失经济能力的阶层在非法跨境贸易中寻找生存手段，在国家忽视或无力提供基本服务或体面的正式工资的情况下，非法跨境贸易成为“弱者的武器”（Azarya and Chazan, 1987）。

1.2 非法跨境贸易管理模式

关于非法跨境贸易管理模式和效果的研究，既有文献主要围绕官方和民间在边境控制和流动中的不同措施与应对机制，主张克服政府-民间、合法-非法等二元论的划分。如，苏晓波等研究了瑞丽与木姐跨境贸易的空间与行政运作，指出中国政府并没有通过等级命令来行使权力，采取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合作控制，打造网络治理——不是为了应对市场功能失调，而是为了克服中缅领土边界带来的结构性问题，揭示了边境合作管制在促进边境合法贸易和遏制非法贸易方面的创新策略（Su and Song, 2024）。Jones（2012）、Titeca 和 Flynn（2014）、Chan（2013）和 Lay 和 Flynn（2020）探讨了政府对非法跨境行为的治理和民间的反应，指出制度密度高、经济增长快的地区非法行为更加普遍，这源于边境制度设计的不协调，要使跨境行为实现可持续需克服政府管控与民间治理的二元论。Grillot（2016）、Werner（2021）、He（2018）和 Bernstein（2011）等围绕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及其之间的关系在边境地区的重要性，指出国家“单干”的管理模式凸显传统的国家独立指挥模式的局限性，因为该模式忽视了非国家行为体在非法跨境贸易中的重要性。Lesser 和 Moisé-Leeman（2009）通过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非法跨境贸易的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改革并不一定能减少非法跨境贸易，各国政府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该地区的非法跨境贸易。边境贸易的合法性与非法性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流动的相互联系，因此国家不能以简单的、静

态的方式对其划分 (Galemba, 2013)。Malik 和 Galien (2020) 重新评估了加强边境非法跨境贸易控制的效果, 认为非法跨境贸易嵌入跨国贸易网络, 对于维持边境社区秩序, 松绑国家行政管辖的限制, 塑造经济和政治权力具有特殊的作用。

1.3 非法跨境贸易的运作机制

针对非法跨境贸易的运作机制, 现有研究主要分为2类。第一类机制的核心是“裙带关系”。“裙带关系”, 原意是相互勾结攀援的妇女姻亲关系 (曹志瑜, 2014), 在非法跨境贸易中, “裙带关系”指为了自身利益而使用或绕过国家法规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如 Johnson 和 Dorosh (2017) 发现, 非洲收入非常低的边境工作人员以通行费或恩惠的名义, 向参与非法跨境贸易的人收取贿赂来赚取额外收入。Jusionyte (2013) 展示了毗邻巴西和巴拉圭的阿根廷小镇伊瓜苏的记者如何根据其社会合法性和利益, 巧妙处理非法跨境贸易行为的易读性和不易读性。Wallrapp 等 (2019) 探讨了国家当局和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在冈仁波齐冬虫夏草跨境贸易中通过利用或绕过国家法规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这些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非法跨境贸易。第二类机制的核心是“反抗”。反抗的实质是允许被边缘化的人群以非法手段为自己创造收入, 独立于压迫性的国家, 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政治选择 (Titeca, 2012)。如通过“新”滇缅公路的摩托车非法跨境贸易是对政府限制边境贸易的反抗, 其实际上是对缅甸反复无常的政策和不完善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的一种抵抗形式 (Chang, 2017)。目前研究所呈现的机制多为“裙带关系”, 本文的非法跨境活牛贸易机制因国家行为体为图谋私利, 利用不透明的权力关系与非法跨境贸易团伙紧密联系, 因而也属于“裙带关系”。

针对中缅之间的牲畜非法跨境贸易, 学界主要围绕驱动因素、跨境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及管理模式 (窦树龙 等, 2019) 等进行深入探讨。如 Nijman 等 (2016; 2017) 以中缅穿山甲、熊的非法跨境贸易为例, 认为中缅边境非法跨境贸易频繁, 除了源于中国市场的强烈需求, 更为重要的是缅甸一侧边境管控的缺乏。Waldron 等 (2022) 探究了中缅跨境活牛贸易合法化问题, 提出针对当前中缅边境长期存在的跨境活牛贸易现象, 中缅两国应将边境牛的贸易纳入常规管理, 对其进行疾病检查和征税。该研究提供了有关中缅之间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检疫及动因分析方面的研究基础。

总体上, 地理学领域的非法跨境贸易研究大多集中于对经济全球化的讨论。已有研究针对资本、信息、商品和文化等跨境流动开展丰富探讨, 为边境地区治理的探索、涉及多种跨境关系的理解和行为体的治理提供新视角。对于非法跨境贸易的影响, 现有研究过于强调合法与非法的二元对立, 事实上, 边境地区代表一种中间性 (in-between), 超越由边界划分的2个主权国家所形成的二元对立, 具有混合的地方特征: 持续流动, 变化不断, 具有开放性和多样性, 这种特征为各种类型的跨境贸易提供土壤。另外, 非法与合法是法律意义上的定义, 与边境地方的实践并不完全吻合。对于管理模式的探索, 已有关于克服二元论的探讨为本文提供了借鉴, 政府条例和法律规定非法贸易的边界, 以此推动有效边境管控。如果地方力量争取不同的解释甚至替代做法, 它们的作用会在当地被削弱。这种现象在远离中央政府控制的边缘地带尤其明显, 而跨境的“裙带关系”进一步弱化“非法”的威慑力。如在印度和孟加拉的跨境活牛贸易中, 超越国籍和宗教的贸易关系广泛存在于双方边境村寨中, 甚至跨越几代人, 形成非常牢固的“裙带关系”, 边民认为活牛走私带来就业机会和生计提升, 也减少活牛盗窃 (Sur, 2020)。这种“裙带关系”和复杂互动也同样出现在中缅之间的活牛贸易, 因而, 有必要避免二元对立的思维, 深入活牛贸易内部网络, 探究其时空过程的演变以及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群体之间的多元互动, 更好地把握非法跨境贸易机制的复杂性。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非法跨境贸易的作用机制, 较少涉及贸易流动的时空过程, 因而本文旨在以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为例, 对其时空过程进行深入剖析, 从而为有效边境管控提供学理支持。

2 研究区域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中缅边境线全长2 185 km, 包括西藏、云南两段, 其中滇缅段为1 997 km, 中国一侧有6个地州、19个边境县、110个边境乡镇、692个行政村与缅甸接壤 (王介南, 2004), 缅甸一侧为掸邦和克钦邦。中缅边境地区地缘相接, 北段地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结合部, 中段处于横断山脉南延部分, 南段多为怒江—萨尔温江、澜沧江—湄公河中游地带, 山水相连, 自然资源丰富。自古以来, 该区域内部各单元之间存在密切而深远的交流互动关系, 跨境民

族同宗同族，人缘相亲，胞波情谊深厚，少数民族文化底蕴丰厚，文缘相融，是有悠久历史的联动交流区。

2.2 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研究方法主要为实地调研法。笔者所在团队进行了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获取一手资料，对已有文献中无法反映的情况进行有益补充。调研时间为2017年1月至2024年3月，调研地点涉及中缅之间的多个边境通道，包括保山市腾冲猴桥、滇滩通道及周边其他民间通道；德宏州瑞丽弄岛及周边村寨，畹町、芒满、混板等通道，盈江县那邦，陇川县拉勐、章凤通道；临沧市沧源县芒卡、龙乃等通道，耿马县孟定清水河，镇康县南伞；普洱市孟连

及沿线地区；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打洛（因怒江州边境地区难以通行，非法跨境活牛贸易极少，故未作为调研地点）。深度访谈主要集中在2024年3月进行，选择64位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访谈对象，包括政府人员、非法从业人员、村民、居民等，每次访谈时间40~60 min。调研过程主要采用普通话和云南方言，少部分采用少数民族语言（聘请当地村干部及本民族的学生进行翻译）。由于边境地区访谈内容的敏感性，本文并未列举全部受访者及其访谈资料，只展示部分具有代表性样本（表1）。此外，由于访谈内容涉及一些敏感和隐私问题，很难得到利益相关者的真实想法；因此，本研究还开展了一些参与式的实地观察，作为重要信息的补充来源。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对象	编码	访谈位置	国籍	性别	年龄/岁	职业	民族	访谈重点
政府人员	G1	德宏州社科院会议室	中国	男	40+	公务员	汉族	抓获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主要时间、地点、数量以及现有的监管措施
	G2	德宏州社科院会议室	中国	男	47+	云南省驻缅甸(内比都)商务代表	汉族	
	G3	南伞口岸	中国	男	36+	边防武警	傣族	
	G4	章凤口岸	中国	男	31+	边防武警	汉族	
	G5	畹町口岸	中国	男	41+	边防武警	白族	
非法从业人员	I1	沧源县勐董镇酒吧街	中国	男	41+	牲畜买卖商	阿昌族	非法跨境活牛的来源、贸易路线及相关社会网络
	I2	沧源县勐董镇酒吧街	缅甸	男	44+	牲畜买卖商	阿昌族	
	I3	沧源县勐董镇酒吧街	中国	男	38+	牲畜买卖商	傣族	
	I4	沧源县勐董镇酒吧街	中国	男	42+	牲畜买卖商	德昂族	
	I5	沧源县芒卡镇某养殖场	中国	男	41+	牲畜买卖商	佤族	
	I6	沧源县芒卡镇某养殖场	中国	男	45+	牲畜买卖商	佤族	
	I7	陇川县陇把镇某养殖场	中国	男	44+	牲畜买卖商	汉族	
村民	V1	勐海县打洛镇	中国	男	50+	农民	佤族	非法跨境活牛的运输方式、数量及主要通道
	V2	盈江县那邦镇	中国	男	52+	农民	傣族	
	V3	沧源县勐董镇	中国	男	43+	农民	佤族	
	V4	腾冲市猴桥镇	中国	女	45+	小卖部老板	汉族	
	V5	镇康县南伞镇	缅甸	女	47+	农民	克钦族	
	V6	中缅边境某农场	中国	男	40+	农场主	傣族	
居民	R1	瑞丽某玉石店	中国	女	35+	瑞丽玉石商人	景颇族	亲属参与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情况
	R2	畹町口岸	缅甸	男	51+	瑞丽玉石商人	果敢族	
	R3	孟连县娜允镇	中国	女	43+	火锅店老板	德昂族	
	R4	瑞丽市弄岛镇	中国	男	45+	司机	汉族	
	R5	沧源县芒卡镇	中国	男	44+	司机	佤族	
	R6	陇川县陇把镇	中国	女	39+	烧烤店老板	汉族	
	R7	中缅边境某农场	缅甸	男	43+	屠宰夫	佤族	

采用的资料和数据还包括历史档案资料、权威媒体报道及部分缅文资料，涵盖牲畜跨境贸易和中缅边境安全相关数据，涉及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和国际法等多个学科领域。关于中国牛肉产量和牛肉消费量的数据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①，中国进口活牛及冻牛肉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官网^②。基于 ArcGIS 空间分析法，使用 Arc-

GIS 10.8 刻画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空间过程与形成机制。

3 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时空过程

3.1 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发展阶段

根据非法跨境活牛贸易数量随时间的变化，将

① <http://www.stats.gov.cn/>

② <http://www.customs.gov.cn/>

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划分为3个阶段：萌芽期、发展期和消退期（表2）。

1) 萌芽期。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呈现较为零散、简单的买卖关系，以小规模的交易为主。改革开放后，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牛肉的需求量随之增加，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统计，牛肉产量由1980年的26.9万t增长为2003年的542.5万t^③，但国内供应市场仍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根据相

关报道（陇川县公安局，2021）和采访数据，该时期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数量从数十头到几百头牛，规模较小，以点状零星交易为主，且多以缅方村民自组织非法跨境贸易为主，通过中方一侧亲戚或同族亲属进行一对一接头。贸易线路主要集中在较为隐蔽的跨境毗连通道，“尤其是一些植被比较茂密的僻静小径，这些地区可满足活牛在跨境移动过程中的饮水和饲料条件”（V1）。

表2 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发展阶段

Table 2 Development stages of illegal cross-border cattl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Myanmar

发展阶段	时间	参与者	每年数量/头	关系
萌芽期	2004年以前	中缅两侧亲戚或同族	0~1 000	亲缘关系
发展期	2004—2018年	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网络参与者	160万~200万	裙带关系
消退期	2018年至今	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网络参与者	1万~20万	裙带关系

2) 发展期。自2003年以来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形成庞大的跨境贸易网络，进入飞速发展阶段。2003年疯牛病的蔓延和2008年“三聚氰胺”的爆发对国内肉牛产业冲击较大（田星，2020），同时，养殖水平较低及养殖成本增加导致中国牛肉产业问题逐渐显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统计，2004—2018年，国内牛肉消费增加42.84%，但同期牛肉产量只增加了14.92%^③。且农业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养牛群体和基础牛源萎缩，进口成为刚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官网数据，2017年中国进口活牛数量为115 364头，2018年增长为156 928头^③，然而，这并未满足中国的需求，牛肉供不应求情况加剧。2002年初，缅甸政府颁布相关法律，禁止活牛出口。直到2017年，缅甸商务部正式发布通告，重新批准活牛出口以刺激跨境经济，活牛出口禁令长达15年（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等，2021）。与此同时，印度也全面禁止对旱牛的屠宰、贸易和食用，因此，存量许多失去用途的旱牛（吴晓黎，2016）。非法贸易者便将印度失去用途及缅甸本国的旱牛赶往中缅边境，非法入境中国，以满足中国市场需求。据不完全统计，2004—2018年，高峰时期从缅甸入境活牛数量每年达到160万~200万头。

3) 消退期。自2018年以来，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数量降至数万至十几万头。一方面，海关总署同有关地方实施“国门利剑2018”，开展打私联合专项行动，非法跨境贸易受到抑制。另一方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云南各边境县设

立隔栏、增加铁丝网以加强空间隔离，并设立电子和人工监控点，同时实行举报偷越国境的奖励性政策（G3-G5）”，形成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边境隔离带，以“增厚”边界（Andreas, 2003）。种种措施推动边境管控的能力提升，反映国家通过可见的主权权力来控制非法跨境贸易的努力（Su, 2022）。

非法跨境活牛贸易者往往根据气候条件和市场趋势决定行动，“倾向于在较为干燥和宜人的凉季进行更多的交易”（R6）。缅甸属于热带季风气候，一年可分为三季——暑季（3月—5月中旬）、雨季（5月中旬—10月底）、凉季（11月—2月底）（倪小漪，2012）。季节特点直接影响非法跨境贸易的数量和规律。如“雨季的时候降水比较多，不利于活牛的驱赶，我们运输的也就比较少，而在暑季和凉季，降水量少，活牛的流通较为便利，我们运输的就会很多（R4）”。因此，在雨季，非法跨境贸易数量较少，每月7万头左右，以养殖、养膘为主。而在暑季和凉季，非法跨境贸易的数量明显增多。尤其在凉季，气候宜人，牛可以在相对舒适的气温下进行长途运输，非法跨境贸易的数量最多，最高可达到27万头/月（图1），“我们这里大概从12月开始吧，天气还是蛮凉爽的，加上这个季节嘛，我们这边吃牛肉火锅的多，牛肉需求高，我们经常在那一块运输（R4、R5）。”

3.2 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空间格局

中缅非法跨境贸易的活牛主要来自缅北和缅印毗邻区。2005年前后，缅北的密支那、八莫、腊戍、登尼、滚弄、达邦、孟拉是牛的主要来源地。

③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官网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http://stats.customs.gov.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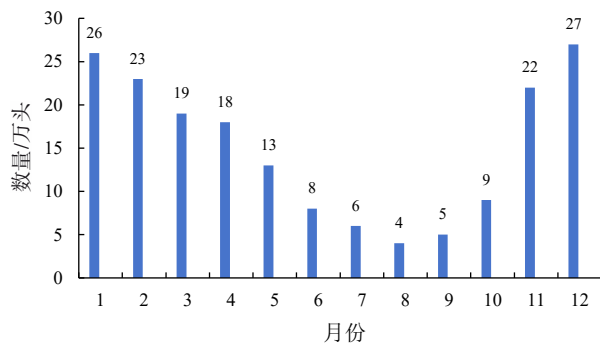


图1 2004—2018年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时间密度

Fig.1 Temporal change of illegal cross-border cattl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Myanmar from 2004 to 2018

2013年后,该区域已没有大规模的牛能出售,主要来源地向缅甸毗邻区转移。云南商人、缅北商人专门在这些地方收购活牛。据受访人表示,“其收购的牛大部分来自印度,缅北商人在印度那加兰邦、曼尼普尔邦、米佐拉姆邦将牛收购后运送到指定交易市场”(I1-I4)。贩牛团伙将牛由缅甸毗邻区运到缅北出售,再将牛运送到中缅边境非法跨境进入中国云南。入境后将牛运送到指定边境农场进行迅速催肥[据调研统计,“中方一侧分布着360~400个能养殖100头牛左右的农场,有近30个能养殖2000头牛的农场”(I5-I7、V6)],少部分在云南当地销售,大部分贩卖到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区,整个过程形成有组织、分阶段的运送体系(图2)。



图2 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空间过程

Fig.2 Spatial process of illegal cross-border cattl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Myanmar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GS(2016)166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从缅甸非法入境中国的活牛贩运路线主要有3条：1) 北线，商贩把印度那加兰邦的活牛从缅甸毗邻区通过民间通道入境缅甸，然后用小货车运输至缅甸克钦邦集中，将印度和缅甸本地的牛运往中缅边境后，以人工驱赶的方式主要经由保山腾冲猴桥、滇滩及周边其他民间通道入境，根据调研访谈估算，每天约600头。

2) 中线，印度曼尼普尔邦、米佐拉姆邦等地的活牛经牛贩运往缅甸实皆省，随后牛贩将缅甸本地和来自印度的活牛用货车运往边境，主要从德宏、临沧入境。据云南省驻缅甸(内比都)商务代表处提供的信息,“2017年通过云南瑞丽弄岛非法跨境流动的活牛每天约1400头,其他通道每天约300~400头,各通道总计每天约2300~3000头”(G2),“继续这样下去,缅甸活牛可能在三五年内被全部跨境贸易完”(G1)。云南省驻缅甸商业协会提供的数据仅为弄岛一天的跨境流动量,根据调研访谈估算,除弄岛地区,德宏州盈江县那邦,陇川拉勐通道、章凤平均每天约300头;临沧沧源县永和、芒卡、龙乃等通道平均每天约300~420头,耿马县孟定清水河平均每天约240头,镇康县南伞及周边村寨平均每天约220头。

3) 南线,牛贩将缅甸马圭省、曼德勒省等地的活牛集中到掸邦后,用货车运至边境,通过民间通道入境中国普洱和西双版纳,根据调研访谈估算,普洱孟连及沿线平均每天牛的跨境流动量约350头,西双版纳勐海县打洛每天约240头。整个

中缅边境北起腾冲滇滩镇,南至勐海打洛均有非法跨境活牛贸易。3条路线中,中线跨境数量最多,其中,通过云南瑞丽弄岛通道跨境流动的缅甸活牛为各个主要通道中最多,北线次之,南线最少。

4 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形成与运作机制

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形成与运作与边境地区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边境地区的地形地貌、河流走向、植被覆盖等自然地理环境具有天然的隐蔽效应,为非法活牛贸易提供便利。而由跨境民族、跨境婚姻及跨境务工等形成的复杂跨境社会网络,为非法活牛贸

易提供“裙带关系”，进而形成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活动（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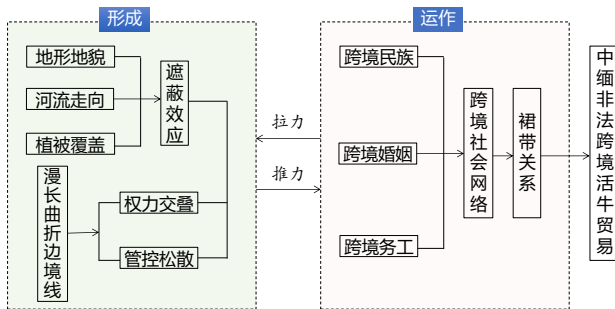


图3 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形成与运作机制

Fig.3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China-Myanmar illegal cross-border live cattle trade

4.1 边境自然地理环境对贸易路线形成的影响

3条主要运输线路形成的原因除了牛的来源，也源于这3处入境地点的民间通道在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上更加便捷有利，因此受到非法跨境贸易者偏好。

自然条件上，滇缅之间1997 km的广泛延长线使得行政管理和边境控制的维持成本非常高，一些中国和缅甸的村庄实际上连接成一个实体，彼此间的边界线更多是象征性而不是功能性，边民或非法跨境贸易者根据良好的地理优势自由改造便捷通道，便于活牛的运输及驱赶。“早期，采用人工驱赶的方式，后来随着目标醒目、一次驱赶数量有限等原因，该方式极少采用”（V2、V3）。“目前，主要采用小货车装载方式，方便快捷”（R4、R5），通常情况下，小货车会趁深夜沿民间通道到达中国。在跨境河流沿线，非法跨境贸易者倾向于使用简易船只，在夜间进行横渡，采取少量多次的偷运方式。该方式在一些河流交通便利的地区比较常见，“如瑞丽河附近的小溪，人可以直接通过”（V4）。一般来说，非法跨境贸易者利用夜晚的掩护，运用简易船只进行跨越河流的行动，以规避监管机构的注意。

非法跨境活牛贸易数量最多的是中线，其中，德宏州瑞丽市西北、西南、东南三面与缅甸山水相连、村寨相望，没有天然屏

障，民间私开通道现象严重，渡口、便道众多，两地跨境民族私下往来频繁，边境管控难度较大，导致该区域成为非法跨境活牛贸易最猖獗的地方。北线的保山边境地区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程度次之。南线的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州相对较少，但私开民间通道现象也较为严重，据实地调查，仅沧源县就存在94个抵边村寨，共200多条民间通道；“孟连口岸附近1 km范围就有12个民间通道”（V5、V6）；其他边境县份也存在大量类似的民间通道，中国政府在控制边境方面面临着广泛监管措施的困难。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区为青藏高原的延伸部分，山地森林广泛分布，特别是在最北段地区海拔最高，存在一些冰川和永久性积雪，难以通行，民间通道较少，该地非法跨境贸易极少。

4.2 复杂跨境社会网络促使活牛贸易得以运转

中缅边境地区“一寨两国、一江两国、一山两国”特征较为明显，两国边境多民族跨境聚居、各村寨之间交流频繁（王昆，2014），导致两国边民出入边境十分频繁（周建新，2002），也为牲畜非法跨境流动提供人际网络上的极大便利。

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社会网络是中缅跨境社会网络中的重要部分，贸易链依靠的社会网络建立在流动、贸易和交换的模式以及已经存在几个世纪的文化和亲属关系网络上。跨境贸易网络关系并非自发地相互作用，但所有参与者都有明确的角色和功能，相互依赖，并在利润、信誉和声誉之间取得平衡，从而创造了一个成熟、有组织、利润丰厚的调节经济再分配和跨境税收的跨境社会网络（图4）。在整个过程中，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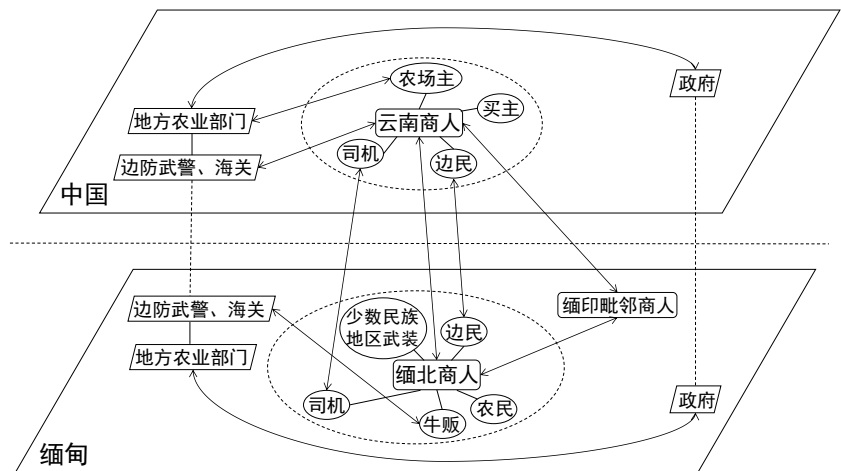


图4 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社会网络

Fig.4 Social network of illegal cross-border cattl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Myanmar

重塑，并在广泛的网络中相互交织，依靠隐形的“裙带关系”，跨境贸易网络得以运转，根深蒂固的“裙带关系”使得无论政府如何努力加强其领土边界以打击非法跨境贸易，云南和缅甸之间的秘密贸易仍在既定的贸易网络和国家规定的背景下存在。

社会网络根据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联系建立。多种非国家行为体在社会网络中存在体制上的不平衡。在缅甸一侧，每个村寨都由两到三个商人控制和支配活牛贸易，“缅甸商人通常与当地的个体养殖户建立长期关系，以确保稳定的货源。他们在村寨间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贸易链，从养殖、运输到销售，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I1-I4）”，这取决于亲属关系以及与社区成员和云南商人之间现有的个人关系，除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外，行为体间的社会关系对于活牛的跨境流通至关重要，“一个人的信誉和声誉也很重要，以便在这个行业中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I7）。因而，缅北商人由于在区域性的社会网络中具有强大的社会和经济嵌入性，使得交易和资源流动成为可能，同时在中央与外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以及跨境行为体间穿梭协调，从而成为牛贩、边民、农民、少数民族地区武装、司机等社会网络的社群核心。嵌入性可理解为缅北商人与网络中其他行为体的个人关系，他们通过这些关系获得资源（Li, 2007）。相对而言，云南商人利用经济资源建立与缅北商人和缅印毗邻商人之间的贸易联系，进而在中国一侧的贸易网络中成为边民、司机、农场主和买主的社群核心。缅北商人与云南商人在国家行为体和更广泛的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互动，依靠广泛的制度资源管理他们的贸易，共同构成一个有能力和动机来挑战国家权威的贸易商群体。边民由于对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地理环境较为熟悉，并具备多种语言和货币的流利运用能力，因此在交流互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若部分边民的国界意识薄弱、法制意识不强，则可能以“运输、望风和提供情报”（R1~R3）等直接或间接参与非法跨境活牛贸易以寻求生计，成为整个贸易链中的“桥梁”角色。在非法跨境贸易中，非国家行为体可谓忽视国家监管的“典型的自由贸易者”（Titeca, 2012）。

国家行为体在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网络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中国地方政府根据主权利，通过边境控制和巡逻、军事存在以及执行来管理跨境贸易；另一方面，缅甸地方政府也高度嵌入跨境网络，根据 Jones（2012）的观点，“边境是主权不完

全的领土”，部分国家行为体间接参与非法跨境活牛贸易，通过提供灵活的监管，在跨境贸易中主观地行使权力，创造性地扭曲规则来获得收入。跨境贸易团伙与极少部分边境县市边防武警、海关关系密切，能准确把握其巡逻的时间及地点，甚至掌握不定期巡逻时间，避开巡查，顺利过境，通过与特定国家行为体建立“裙带关系”牢牢控制这种贸易，“并将潜在的外部竞争对手排挤出去”（I5、I6）。在整个过程中，边境控制更多地受到经济利益而不是国家安全的驱动，国家一级的官方贸易和海关政策与边境的地方现实和做法之间存在脱节，显示“裙带关系”的经济模糊性。

另外，抽象法律和实际执法之间的差距，或者 Feldman（2019）所说的国家主权和个人主权之间的差距是“裙带关系”得以发展的基础，体现由中央权力、地方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构成的主权的多方面。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在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边境地区减贫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但地方政府为了地方经济发展和个人利益成为“裙带关系”中的重要参与者，部分国家行为体凭借广泛的制度资源选择性地监管非法跨境贸易，“裙带关系”可以影响国家对跨境贸易法规的解释和执行，这为这些国家行为体施加控制或被非法跨境贸易侵蚀留下空间。如跨境贸易的“活牛并非商人自己养殖，而是从各地收集购买来的耕牛，部分则由牛贩偷盗农民的耕牛而得”（R7）。根据调研访谈估算，在2017年缅甸收购一头牛的成本价格大约为2 500元，其他费用包括缅甸境内运费约1 500元/头、少数民族武装控制区通关费和过路费约1 000元/头、由国家行为体协助的过境费约1 000元/头，加上运输过程中的饲料损耗，成本大约为7 000元/头。另外，农场主与地方农业部门联系频繁，进入中国后通过伪造禽畜标识和检疫证明等特殊手段将牛合法化，并“将牛在中方一侧边境农场迅速催肥”（I6），“每头牛售价可高达11 000~12 000元，高出收购价三四倍，净利润4 000余元/头”（I7）。跨境行为体从中缅之间相互关联的经济联系中获利，“裙带关系”便得以延续发展。

换言之，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依靠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建立的跨境“裙带关系”为其提供的信任纽带、规范和执行机制，形成完整的社会网络贸易链接。各行为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是形成“裙带关系”的推动力，“裙带关系”通过持久的互惠形式得以维持，并基于特定的行为准则、

不透明的权力关系和口头传递的规则,其中,信誉和声誉是“裙带关系”得以延续的关键,同时因其对国家主权的挑战进一步撕裂中缅之间的漏洞边界。此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由于合法贸易的便利化为非法跨境贸易者提供从事新贸易模式的机会,因而“裙带关系”和跨国经济一体化使跨境社会网络具有弹性和有效性。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通过对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过程进行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从时间阶段来看,大致经历3个阶段:2004年以前处于萌芽期;2004—2018年进入发展和高峰期,非法跨境活牛贸易逐渐频繁;2018年进入消退期,非法跨境贸易数量骤降为每年数万头至十几万头。2)空间上,从缅甸非法入境中国的活牛贩运路线主要有北线、中线和南线3条,且跨境流动不均衡、方式多样。3)非法跨境活牛贸易主要依靠自然地理条件和以缅北商人和云南商人为社群核心的社会网络运作,“裙带关系”为其提供信任纽带、规范和执行机制,形成完整的贸易链条。这些发现为有针对性地提出防范和控制非法跨境贸易提供参考。虽然活牛非法跨境可被视为非法跨境贸易的一种,但由于活牛体量较大,运输较为困难,也更容易被觉察和发现,因而其非法跨境路线的选择与一般小型的物品存在较大差异,受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人际网络等因素的影响更明显。本文提供了考察非法跨境贸易与人文、自然地理条件之间关系的独特案例。

5.2 防控建议

边境管控并非简单地开放或关闭边界,而是一个需要高度选择性地促进合法贸易和打击非法贸易的过程,否则由国产、进口、非法跨境贸易三方协同作用所保证的价格安全一旦失去平衡,将影响中国肉牛产业发展未来走向。面对在“裙带关系”和复杂互动中出现的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必须在综合考虑基础上进行解决,而不是粗暴管制甚至取缔(刘云刚等,2011)。边境管控的目的不是在边境上确立某种形式的绝对主权,而是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因此既需要“硬化”边界,也需要“软化”边界。前者包括加强国家对非法跨境贸易的控制,而后者意味着放松国家控制,以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的合法流动。如何平衡贸易便利化与边境治理,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因为各国面临如何促进合法跨境贸易的同时执行法律打击非法跨境贸易日益困难的困境。

针对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新趋势、新特点,也为应对非法跨境活牛贸易可能长期存在于中缅边境的社会现实,本文提出2点防控建议:1)保障合法的跨境牛贸易,解构非法“裙带关系”。中缅两国政府、企业合作,实现养殖资源与高新技术有机结合,形成跨境经济的区域空间。同时,简化贸易制度、提高有关贸易法规和费用透明度、改善边境机构协调,从而降低因遵守相关法规和支付费用而产生的直接贸易成本、因边境等待时间和贸易环境缺乏可预测性而产生的间接成本,以及帮助贸易商理解并遵守贸易法规等,将双方在边境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特殊利益作为共识,以此解构“裙带关系”。2)实施多层次网络治理,推动智慧边境建设。公安边防和海关缉私部等部门在充分了解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现状和规律的基础上,增加武装巡查人员,强化边境巡查,形成打击合力,推动传统边境管理向“数字边境”和“智慧边境”发展。开发现代边境管控防御系统,让抵边村寨居民有偿安装,政府对居民的有效举报实施奖励。构建边境养殖数据库,对出栏率异常的农场重点监控。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Ackleson J. 2005. Constructing Security on the Us-Mexico Border. *Political Geography*, 24(2): 165-184.
- Anderson J and O'dowd L. 1999. Borders, Border Regions and Territoriality: Contradictory Meanings, Changing Significance. *Regional Studies*, 33(7): 593-604.
- Andreas P and Friman H R. 1999. The Illicit Global Economy and State Power.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5(3): 492-493.
- Andreas P. 2003. Redrawing the Line: Borders and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2): 78-111.
- Aucoin M. 2020. Smuggling and Sovereignty: Individual Agencies within the Structures of Human Smuggling and Enforcement in the Mediterranean. *Geopolitics*, 25(2): 538-543.
- Azarya V and Chazan N. 1987. Disengagement from the State in Africa: Reflections on the Experience of Ghana and Guine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1): 106-131.
- Bernstein S. 2011. Legitimacy in Intergovernmental and Non-State Global Governa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8(1): 17-51.
- 曹志瑜. 2014. 裙带关系与反腐机制创新. 领导科学, (3): 7-8. [Cao Zhiyu. 2014. Nepotism and Anti-Corruption Mechanism Innovation. *Leadership Science*, (3): 7-8.]
- Chan Y W. 2013. *Vietnamese-Chinese Relationships at the Borderlands: Trade, Tour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 Routledge.
- Chan Y W and Womack B. 2016. Not Merely a Border: Borderland Governance, Development and Transborder Relations in Asia. *Asian Anthropology*, 15(2): 95-103.
- Chang W C. 2017. On the 'New' Burma Road: from Mule Caravans to Motorcycle Bands. *TRaNS: Trans-Regional and-National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 5(2): 217-242.
- Dean K. 2005. Spaces and Territorialities on the Sino-Burmese Boundary: China, Burma and the Kachin. *Political Geography*, 24(7): 808-830.
- 窦树龙, 康伟, 窦树昊, 仇松寅, 江红旗, 纪帆, 李凌枫. 2019. GIS辅助下的我国跨境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新探索. *中国动物检疫*, 36(2): 31-34, 72. [Dou Shulong, Kang Wei, Dou Shuhao, Qiu Songyin, Jiang Hongqi, Ji Fan, and Li Lingfeng. 2019. A New Exploration on GIS-Based Regionalization Management of Cross-Border Animal Diseases in China. *China Animal Health Inspection*, 36(2): 31-34, 72.]
- Feldman G. 2019. *The Gray Zone: Sovereignty, Human Smuggling, and Undercover Police Investigation in Europ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lint C and Taylor P J. 2018.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London: Routledge.
- Galemba R B. 2013. Illegality and Invisibility at Margins and Borders. *PoLAR: 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 36(2): 274-285.
- Gellner D. 2014. *Borderland Lives in Northern South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Gereffi G, Humphrey J, and Sturgeon T. 2005.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2(1): 78-104.
- Gregory D, Johnston R, Pratt G, Watts M, and Whatmore S. 2011.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Grillot C. 2016. Trust Facilitates Business, But May Also Ruin It: The Hazardous Facets of Sino-Vietnamese Border Trade. *Asian Anthropol*, 15(2): 169-185.
- He J, Yang B, Dong M, and Wang Y. 2018. Crossing the Roof of the World: Trade in Medicinal Plants from Nepal to China.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224: 100-110.
- Ian G B and Li C. 2017. Variegated Borderlands Governance in Dehong Dai-Jingpo Autonomous Prefecture along the China-Myanmar Border. *Geoforum*, 85: 214-224.
- Johnson M E and Dorosh P. 2017. Tariffs, Smuggling and Economic Welfare: A Spatial Analysis of Nigerian Rice Policy Options.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26(4): 516-538.
- Jones R. 2012. Spaces of Refusal: Rethinking Sovereign Power and Resistance at the Border.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02(3): 685-699.
- Jusionyte I. 2013. On and off the Record: The Production of Legitimacy in an Argentine Border Town. *PoLAR: 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 36(2): 231-248.
- Karras A L. 2009. *Smuggling: Contraband and Corruption in World Histor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Lay C and Astrina A R. 2020. The Limits of the Multipl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Border Control: A Case Study of Immigration, Customs, and the Indonesian Maritime Security Agency in Batam, Indonesia. *Pacific Affairs*, 93(1): 113-134.
- Lesser C and Moisé-Leeman E. 2009. *Informal Cross-Border Trade and Trade Facilitation Reform in Sub-Saharan Africa*. Paris: OECD Publishing.
- 李灿松, 胡志丁, 葛岳静, 别乾龙. 2014. 当前国外政治地理学边境安全研究进展. *热带地理*, 34(4): 454-462. [Li Cansong, Hu Zhiding, Ge Yuejing, and Bie Qianlong. 2014. Progress of Foreign Political Geography in Border Security Studies. *Tropical Geography*, 34(4): 454-462.]
- Li C and Su X. 2022. Cross-Bord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China's Border Control Upon Myanmar Migrant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Politics and Space*, 40(8): 1727-1744.
- Li P P. 2007. Social Tie,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Behavior: Toward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Informal Exchang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4: 227-246.
- Little P D, Tiki W, and Debsu D N. 2015. Formal or Informal, Legal or Illegal: The Ambiguous Nature of Cross-Border Livestock Trade in the Horn of Africa. *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 30(3): 405-421.
- 刘云刚, 王丰龙. 2011. 城乡结合部的空间生产与黑色集群——广州M垃圾猪场的案例研究. *地理科学*, 31(5): 563-569. [Liu Yungang and Wang Fenglong. 2011.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the Black Cluster in the Urban-Rural Frontier: A Case Study of M Garbage Pig Farm in Guangzhou Cit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1(5): 563-569.]
- 陇川县公安局. 2021. 陇川警方铁腕严打跨境违法犯罪! (2021-02-25) [2024-05-30]. https://www.dhlc.gov.cn/gaj/Web/_F0_0_0476I8NQ9V4HOIX32MHVPI0FK3.htm. [Longchuan County Public Security Bureau. 2021. Longchuan Police Crack Down on Cross-Border Crimes with an Iron Fist! (2021-02-25) [2024-05-30]. https://www.dhlc.gov.cn/gaj/Web/_F0_0_0476I8NQ9V4HOIX32MHVPI0FK3.htm.]
- Malik A and Gallien M. 2020. Border Economies of the Middle East: Why Do They Matter for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7(3): 732-762.
- Minghi J V. 1963. Boundary Studie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3(3): 407-428.
- Newman D and Paasi A. 1998. Fences and Neighbours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Boundary Narrative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2(2): 186-207.
- Newman D. 2006. The Lines that Continue to Separate Us: Borders in Our 'Borderless' World.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0(2): 143-161.
- Nijman V. 2010. An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Wildlife Trade from Southeast Asia.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19(4): 1101-1114.
- Nijman V, Zhang M X, and Shepherd C R. 2016. Pangolin Trade in the Mong La Wildlife Market and the Role of Myanmar in the Smuggling of Pangolins into China. *Global Ecology and*

- Conservation*, 5: 118-126.
- Nijman V, Oo H, and Shwe N M. 2017. Assessing the Illegal Bear Trade in Myanmar Through Conversations with Poachers: Topology, Perceptions, and Trade Links to China. *Human Dimensions of Wildlife*, 22(2): 172-182.
- 倪小漪. 2012. 基于园林微气候的缅甸文轩禅园设计. 北京: 清华大学. [Ni Xiaoyi. 2012. *Myanmar Wenxuan Meditation Center Design Based on Microclimate of Gardens*.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 Phelps J, Webb E L, Bickford D, Nijman V, and Sodhi N S. 2010. Boosting Cites. *Science*, 330(6012): 1752-1753.
-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 2021.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缅甸(2020年版). (2021-06-03) [2022-04-26]. <http://fta.mofcom.gov.cn/rcep/rceppdf/miandian.pdf>.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y,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Office of the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and Departme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Commerce. 2021. Foreign Investment Cooperation Country (Region) Guide-Myanmar (2020 Edition). (2021-06-03) [2022-04-26]. <http://fta.mofcom.gov.cn/rcep/rceppdf/miandian.pdf>.]
- Smith K F, Behrens M, Schloegel L M, Marano N, Burgiel S, and Daszak P. 2009. Reducing the Risks of the Wildlife Trade. *Science*, 324(5927): 594-595.
- Su X and Li C. 2021. Bordering Dynamics and the Geopolitics of Cross-Border Tourism between China and Myanmar. *Political Geography*, 86: 102372.
- Su X and Song J. 2024. Cooperative Control and the Governance of Cross-Border Trade in Chinese Border Cities. *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 12(2): 318-336.
- Su X. 2022. Smuggling and the Exercise of Effective Sovereignty at the China-Myanmar B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9(4): 1135-1158.
- Sur M. 2020. Time at Its Margins: Cattle Smuggling Across the India-Bangladesh Border. *Cultural Anthropology*, 35(4): 546-574.
- 田星. 2020.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牛肉的影响研究.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Tian Xing. 2020. *A Study on Effect of China-Australia Fta on China's Import of Beef from Australia*.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Titeca K. 2012. Tycoons and Contraband: Informal Cross-Border Trade in West Nile, North-Western Uganda. *Journal of Eastern African Studies*, 6(1): 47-63.
- Titeca K and Flynn R. 2014. "Hybrid Governance", Legitimacy, and (Il) Legality in the Informal Cross-Border Trade in Panyimur, Northwest Ugand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57(1): 71-91.
- Waldron S, Zhizhi S, Myint T, and Smith D. 2022. China's Cross-Border Economic Integration: Formalising Cattle Imports from Myanmar.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2): 101-133.
- Wallrapp C, Faust H, and Keck M. 2019.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Borderlands: Cross-Border Yarsagumba Trade in the Kailash Landscape.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66: 67-76.
- 王介南. 2004. 缅中关系与我国西南周边安全.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4): 57-60. [Wang Jiannan. 2004. Myanmar-China Relations and the Security of China's Southwestern Periphery. *Forum of World Economics & Politics*, (4): 57-60.]
- 王昆. 2014. 跨境地区合作与空间发展. 北京: 清华大学. [Wang Kun. 2014. *The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 Werner M. 2021. Geographies of Production II: Thinking Through the Stat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5(1): 178-189.
- Woods K. 2011. Conflict Timber along the China-Burma Border: Connecting the Global Timber Consumer with Violent Extraction Sites. In: Tagliacozzo Eric and Chang Wen-Chin. *Chinese Circulation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480-506.
- 吴泓. 2017. 缅甸民族问题与我国西南边疆安全. 聊城: 聊城大学. [Wu Feng. 2017. *Ethnic Issues in Myanmar and Security in China's Southwest Frontier*. Liaocheng: Liaocheng University.]
- 吴晓黎. 2016. 解析印度禁屠牛令争议——有关宗教情感、经济理性与文化政治. 世界民族, (5): 77-89. [Wu Xiaoli. 2016. Religious Sentiment,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Cultural Politics. *Journal of World Peoples Studies*, (5): 77-89.]
- 许欣. 2021. 农业机械化赋能工农协调发展效果研究. 郑州: 河南农业大学. [Xu Xin. 2021.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Empowering Industry-Agricultur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Zhengzhou: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Zhou C, Wu S, and Su X. 2022. Cross-Border Livelihood: Trade, Labor, and Internal Displacement at the Myanmar-China Border. *Geoforum*, 129: 49-59.
- 周建新. 2002. 跨国民族类型与和平跨居模式讨论.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 60-64. [Zhou Jianxin. 2002. Varieties of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and Transnational Settlement Model.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 60-64.]

作者贡献声明:

董晓芳: 开展调研, 负责处理研究数据和绘图, 分析数据, 撰写及修改全文;

李灿松、饶允昌: 确定选题和研究思路, 设计论文框架, 组织全程的调研和资料收集, 指导研究全过程并修改全文;

刘晓凤: 提出修改意见, 参与文章的校对和修改。

Spatiotemporal Proces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Illegal Cross-Border Cattl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Myanmar

Dong Xiaofang¹, Li Cansong^{1,2}, Liu Xiaofeng³, and Rao Yunchang¹

(1. Faculty of Geography,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2. Southwest Joint Graduate School of Yunnan Province, Kunming 650092, China; 3.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119077, Singapore)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border security has been a pressing issue in political geography. With the increas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border security has increas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Security issues along the China-Myanmar border are particularly eye-catching owing to Myanmar's fast-chang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reforms and unrest, as well as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 in Northern Myanmar that has gathered a large number of armed ethnic minorities. Tensions have resulted in prominent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along the China-Myanmar border. Illegal cross-border trade is on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the region; specifically, illegal cross-border cattle trade is a particular but understudied cas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ctors, transport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involved in illegal cross-border cattle trade. Using first-hand materials collected in the border area and secondary archives, the study analyze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features and operation mechanisms of smuggling.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ime stage, the study identifies approximately three stages. Before 2004, the illegal cross-border cattle trade, relying on kin relationships, was in its embryonic stage. From 2004 to 2018, the domestic beef market was in short supply, and the illegal cross-border cattle trade, this time relying on nepotism, gradually became more frequent, reaching 1.6-2 million heads per year and entering the development stage.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 2018 and 2020, owing to the enhanced border control, the volume of illegal cross-border trade has plummeted, decreasing by around tens of thousands to more than 100,000 each year, and then entering a period of extinction. (2) Spatially, illegal cross-border trade mainly comprises three routes: the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routes, from northern India to China's Yunnan Province through northern Myanmar. Among the three routes, the middle route sees the largest number of cross-border cattle, among which, the cross-border flow of cattle from Myanmar through the Yunnan Ruili Nongdao channel is the largest, followed by the northern route; the southern route sees the lowest number. (3) The China-Myanmar illegal cross-border cattle trade relies on the trust bond, regulation, and enforcement mechanism provided by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cross-border nepotism, thus forming a complete social network trade chain. The study suggests methods to control illegal cross-border trade by simplifying formal trade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borders. The findings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llegal cross-border trade. Although illegal cross-border cattle trade can be regarded as a type of illegal cross-border trade, owing to the large volume of live cattle, the transportation is more difficult, and it is easier to detect. As such, the choice of illegal cross-border routes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general small goods and is more obviously affected by natural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and interpersonal network factors. Thus, illegal cross-border cattle trade provides a unique case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illegal cross-border trade and human, physical,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Keywords: illegal cross-border cattle trade; cross-border trade; social network trade chain; China-Myanmar border; "nepotism"